

马 戎 著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华夏出版社



马戎著

社会学的
应用研究

费孝通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马戎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

ISBN 7-5080-2849-X

I. 社… II. 马… III. 应用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568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马戎 著

策 划:刘力 陈小兰

责任编辑:陈浩莺

封面设计:于名川

出 版 者: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人卫印刷厂

规 格:670×970 16开

印 张:23

字 数:370千字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1
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体文化·····	18
罪与孽——试论当代中国的法治与德治·····	33
“科层制”与“官僚制” ——韦伯和列宁关于“Bureaucracy”的论述·····	49
人文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	60
小城镇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	74
我国小城镇的结构特征与进镇人口迁移·····	95
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	122
“中华经济圈”与它的社会、文化基础·····	155
试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175
中国居民在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	192
试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232
西部开发、劳动力流动与少数民族教育·····	251
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经费问题·····	268
附录： 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309
试谈社会学学位论文的写作·····	324
户访调查的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41
后 记·····	361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介绍社会学：

1. 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 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社会学的哪些研究视角和方法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并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了种种疑问。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定义是“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与社会的学科”（Giddens, 1997：2）。

* 本文原刊载于《北大讲座》编委会编《北大讲座》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在收入本文集时进行了修订。

注：本文集引文注释采用国外“Reference”注释方法，作者姓名后为该文献出版年，如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同一个作者在同一年中的多篇文献，则用a、b、c等加以区别，冒号后为引文在该文献中的具体页数以便核对。

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认为,“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波普诺,1999:3)。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研究的对象)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社会学是一个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学科。

如果我们从孔德于19世纪中叶第一次提出“社会学”这个名词算起,这个学科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学科基础理论最早的奠基人当中,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大家在阅读中有可能了解的马克斯·韦伯和迪尔凯姆(或译作涂尔干),他们都是在理论上自成系统的大思想家。在他们之后,各国社会学也都出现了各自的领袖人物与不同的学派。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会学已经逐步形成了本学科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与专题。如果我们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著的《社会学》教科书中的介绍为参考,社会学比较著名和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有: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互动和社会生活,性别、家庭和婚姻,饮食、疾病和老年,失范和犯罪,种族和族群,社会分层和阶级结构,现代组织,工作与经济生活,政府、政治权力与战争,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教育与宗教,城市化与都市生活,革命与社会运动,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等等(Giddens,1997)。从这个单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广泛,同时它的研究触角已经深入到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许多研究专题与其他学科相重合。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社会学仍然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地得到发展呢?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同样也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社会学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其主要区别并不在于社会学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心理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等,并且由此产生了用以解释、分析各个领域里的重要社会现象与变化规律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

当然,由于各个学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不断地向其他学科借

鉴、学习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和理论与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也必然存在着部分交叉、相互重合或密切相连的现象。但是由于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因此这个学科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近年来反而成了其他学科(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吸收理论营养、研究方法和研究灵感的重要来源。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所具有的独特研究视角呢?

(1)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效用。在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中,人类比宇宙里的其他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因为在人类社会当中所出现的各种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彼此都不是孤立发生、变化和存在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限定各自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来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相互分隔开的领域,并刻板地认为每个学科只应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动态系统,只有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各个学科各自的偏重与片面性,也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去探讨社会演变的真理。

举例来说,假如我们想研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与存在的问题,就不能脱离开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子女教育的态度等方面的综合性分析。需要从政府经济发展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那里了解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规划,从劳动部门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与变化,从学校了解教育系统的现行体制,我们需要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与就业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还要与学生、教师、家长和劳动用工单位管理人员交谈,以便得到对现实教育体系的多视角评估。在这些多方面调查和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和改进建议。这与教育学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显然带有更高的综合性。

(2)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

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社会中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还存在着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差异。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就很不一样。正是由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并存,人们在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科技与文明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也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各有各的特点。所以,“多样性”或者说“多元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在结构上呈现出多层次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那些年代,由于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以及旅行的困难给不同地区和各国之间的人员及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因此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并形成了其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所以在地球上的各个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人类社会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文化与社会多样性。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而且每个个体也都具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出现“克隆人”,目前没有两个人是真正完全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从多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的问题。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认为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用这个视角分析,在解释个人行为的时候就比单纯强调其中的某一个角色、某一重身份,显得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比如在解放前,有一个资本家,他凭靠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工人存在着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他与被雇佣的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而同时他又可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另外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日寇入侵时他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积极奔走;在政治上他有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不赞成共产党剥夺和消灭资本家的主张;与此同时,他在家庭中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是共产党员之后,没有“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在这个特定的人身上,实际是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以上的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由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实施的。应

当说这样多重角色的分析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等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在解释这个特定的人所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变化,这决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决策者在制定这个政策时,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在当时社会的特定环境下,会有一些原因促使他特别关注某些因素而可能忽视另外一些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施时,会出现一些决策者预料到了并且期待的来自社会上的反应,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决策者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其他反应。执行这一政策后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在观察到了实际进程中出现的结果后,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各个群体的反应,调查他们之间的互动,分析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也才能找出最初设计与最后结果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

例如,在 80 年代中期,沿海地区出现了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进行竞争的现象。在主管国营企业的各部委的推动下,政府出台了一些限制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就是在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乡镇企业反而迅猛地发展起来了,而许多国营企业则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就证明我们对国营企业存在的弊病和乡镇企业的生命力缺乏客观的认识。在 90 年代初期,我们在调查乡镇企业时,特别注意了对企业运行机制的调查分析,不仅仅注意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生产要素的组织与调动、利益和风险分配机制等等;另外我们还特别注意调查企业中各类群体(干部、职工、社区其他成员)对于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和他们对于企业运行体制的评价。这些调查的结果解释了乡镇企业在市场导向下是如何利用各种社区资源而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以及灵活的推销机制等经营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它们在市场与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国营企业竞争时占了上风。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点呢?

(1)首先,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从而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1)。所以社会学最最核心的精神应当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同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这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获得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那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理性化的知识,使之最后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社会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当时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也十分注意把对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我们需要在调查中通过分析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再通过分析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比如,目前在北京大约有 250 万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他们的人口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他们在北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他们的收入来源(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模式,他们在北京的居住格局,他们与迁出地的联系,他们在北京形成的“有形”和“无形”的社区组织,他们与北京基层政府和市民之间有哪些交往,等等。以上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小型社区以及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深入调查才能够得到。在对这些专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了解这些流动人口的生活与工作,理解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一些学者近来发表的关于京城“浙江村”的研究,就是社会学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的很好范例。

(3)在方法上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我们不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即数字化,否则无法衡量,更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比如有人告诉你说,某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是不会感到满意的,因为这里讲的只是他个人的“印象”,没有科学根据,这个笼统印象无法证明这个地区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如果他告诉你,1970 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 10% 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全部登记的婚姻中只有 1% 属于族际通婚,而到了 1995 年,两个民族都有 80% 的成员掌握了对方的语言,而在登记的婚姻中有 30% 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语言与通婚)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是否能说明宏观群体的基本特征,从而以此确定在对个体调查中所获得的信息,对于整体而言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如一个工厂生产了 10 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 100 个瓶子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结果,我们就可以根据概率统计讲,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比如说 95% 的信心),确认这 10 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是多高。这是数

学证明了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学习并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社会学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都可以使用计算机来进行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强调“比较研究”。大和小,高和底,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相互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实际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社会事物和现象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对于这些方面,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即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又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同时,“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如把我国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与今天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看看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之后,我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哪些具有应用性的知识。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业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实际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来对待奖金,一种是全班组商议好了,

大家轮流评“优秀”拿奖金,这是“轮流坐庄”的办法,最后人人都有份;另一种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都请到饭馆里,大家一顿把奖金全部吃掉。那时如果拿到奖金的人没有这样做,而是真的把奖金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里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你是优秀,这些活就你来干吧”。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效率和业绩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产值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实力,政府后来对于国有企业所实行的改革(如对于亏损企业的“关停并转”)也很难下决心。人们长期在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付出的价格比国有企业所付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从银行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缴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多,它们职工的素质也显然比不上国有企业职工,在进口设备原料时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种种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乡镇企业产品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到钱,还能够有资金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从资金、劳动力素质、设备、原材料价格、市场推销成本等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来看,国有企业样样都优于乡镇企业,所以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无法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这一现象的。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剖析在乡镇企业中这些“生产要素”的真实状况与它们的组合机制。

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行业、不同经营状况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乡镇企业称不上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它们是社

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本,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不论是否做工,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在他们的“成本”中基本没有“饭费”、“住宿费”这些考虑,这与城里国有企业工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农民们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多少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闲呆着要好,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从而大大降低了乡镇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乡镇企业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不发工资甚至还可能从职工中集资来维持企业的生存,这在城里的国营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食品加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乡镇企业的干部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不同的群体对于“成本”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而且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人们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 80 年代以来,深感“文革”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西方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在中国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很不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而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那是人大开会举举手、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修订为中国的法律,并且在人大投票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出现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

社区内寻求调解,到了法院之后,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

在民众当中,各地传统上都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在“是”与“非”的理念上,在对于违反本地社区道德规则的行为(如不孝敬老人)的惩戒办法方面,民间社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做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这些民间的习惯法,在保持社会伦理道德、保持社会秩序方面,应当说还是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全国范围的行政、法制、市场逐步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必然将会逐步取代各个地区民间的习惯法,而这是一个不能“一蹴而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各级基层法院在执行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如果不考虑当地的传统和实际效果,简单地执行政府的法律,就会使当地社区的行为规范造成混乱,电影《被告山杠爷》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群体,我们目前称之为“民族”,如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但是从群体的政治含义、文化含义等方面和其他国家的称呼来看,其实称之为“族群”(ethnic group)似乎比“民族”(nation)更加合理。由于大家习惯叫“民族”,这里我仍然沿用这个名称。

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反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族际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可能会面临着再分配,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可能随人口迁移和外部文化的进入而逐步消失,国际力量也可能出于各种考虑而介入和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这些情况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可能促进国内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毫无疑问,民族矛盾的升温会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和国家的解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始终存在民族关系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

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且应当说,这是“西部开发”战略成败的关键。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被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们总结出了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系列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衡量与测度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方面,都总结发展出了一套指标体系,当我们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时,这些指标和研究方法都可以加以借鉴。应用了这些系统化了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来进行测度和分析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中国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一度受到当时苏联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影响。苏联把民族问题主要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而且从个人的“民族身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设立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等方法把少数民族问题制度化了。而美国每年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几十万移民,政府和主流社会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采用“公民权利”的思路来扶助和保障少数民族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苏联和美国体现了两种十分不同的思路,应当说,这两种思路都值得我们根据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来进行反思、比较与借鉴。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则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整个社会运行体系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学校,从社会与学校之间的联结环节(入学、毕业)与日常互动(学生、教师与家长这三方面的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学校教育。在学生上学期间,家庭、社会对孩子的影响与学校、教师对孩子的影响是同时在发挥作用的,如果研究教育的人只关注学校和校内教育,无疑是具有片面性的。

我们在学校里培养学生,是为了学生升学和本校的升学率?还是为了使成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在知识技能和心理道德各方面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如果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哪些能够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哪些完

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我们如何在学校里培养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如何使孩子们在学习与娱乐中去学习与别人合作？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我们在 1995 年组织了全国 6 省（区）24 县的教育调查，就是努力通过实地调查来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道德、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机构精简为例，我国许多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有 2000 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 5% 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让给社会的管理机构，哪些工作是完全不需要进行的，哪些“工作”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只有在对于各个机构的工作职责和工作量进行具体调查计量和分析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方案。

现在国内外人们最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农村的选举。由农民自己来选举村委会甚至乡镇政府的领导人，这无疑是一件大事。但是基层选举的实际过程究竟怎样，效果如何？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才能了解。是否在一个大姓家族占据多数的社区，这个家族能够主宰选举？是否存在贿选或者利用黑社会威胁手段获得选票的可能性？当一个社区领导者的决策和作法有利于本社区成员的实际利益但却损害国家利益时（如盗伐国家林场、私自分配集体财产、设厂制造伪劣产品或容忍社区成员造假等等），这样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当选？是否应当当选？这些问题在实际选举过程中是否出现？有哪些表现形